

尼赫鲁与甘地的 历史交往

尚劝余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

尚劝余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成都

责任编辑:朱蓉贞 杨 海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戴雨虹

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

尚劝余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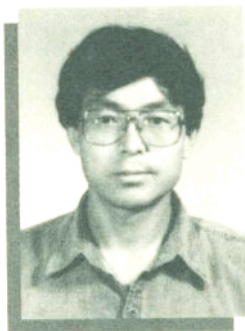
冶金部西南勘察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0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835-1/D·679 印数:1-1000

定价:17 元



尚劝余，1961年11月生，陕西长武人。1984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宝鸡文理学院、湛江师范学院，现为湛江师院副教授，历史哲学所副所长。

著有《世界十大探险家》、《世界十大皇帝》、《世界十大女王》、《尼赫鲁研究》、《阿拉伯帝国的兴衰》等。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有些被《文摘报》、《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历史学年鉴》、《世界史》、《国际政治》等转载和收录。

前 言

历史交往是一个历史哲学概念，是一种考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独特视角，即以历史的维度考察交往或以交往的视角研究历史。历史交往是人类社会历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纵贯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永恒的普遍现象，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庞大的动态系统。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交往演化史。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交往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细胞，一切人类社会历史交往归根结蒂都是个人交往，任何形式的群体交往都不过是个人的间接表现形式。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就是人类历史交往的滔滔洪流中一朵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浪花。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原名为《尼赫鲁与甘地》，于1992年10月着手搜集资料，1993年8月动笔写作，1994年1月完稿，同年4月定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稿尘封长达数年之久。其间，各位尊师好友曾为本书的问世，鼎力相助，奔走呼号，令我终生感动。本书付梓之际，定名为《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为保持原貌，原稿未作只字变动，只在书后附有《历史交往概论》一文，权作尼赫鲁与甘地历史交往的理论诠释。

在此，谨将这本尘封数载终于面世的著作，奉献给学术界的前辈与同仁；奉献给关心、爱护过它的尊师与好友；也奉献给成书期间和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同窗学友！

序 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反映了一个中国青年学者研究视角中的南亚两位伟人——甘地与尼赫鲁之间密切的历史交往。

甘地和尼赫鲁都是国外学者经常提到的“奇里斯玛”型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物。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奇里斯玛”型领导人的特点是：有真正鲜明的个性领导风格、超凡的创造力和与其追随者心理交流的能力；能够通过一些不同寻常的宗教、历史、自然或者带有象征性的事件，对所制定的计划和进行的活动做出合理的印证；具有可以改变政治事件发展进程的潜力；能以实质性的有说服力的新制度原则，使社会焕发活力，出现新面貌，达到新水平，或者发生其他变化，使社会恢复公正状况；在有觉悟的民众想象中，奇里斯玛应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提高他们的自尊。

这5条对“奇里斯玛”型领袖的界定，无疑是符合甘地和尼赫鲁在印度、南亚以至世界范围所处的地位与产生的影响。但是，甘地与尼赫鲁这两位“奇里斯玛”型领导人物的突出特点，在于他们作为现代南亚上下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密切的历史交往，而正是这种极富有特征的政治合作关系的历史交往，保证了南亚民族民主运动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当代印度社会的基础，从而使他们在历史上起到了世界性的作用。

甘地和尼赫鲁从1919年到1947年有近30年的历史交往。在这些年代里南亚社会处于由殖民地走向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大

转变时期，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也处于前后交接时期。甘地发现了尼赫鲁，尼赫鲁也在敬仰甘地的环境中成长。1919年，苦闷不安的青年尼赫鲁在对甘地的第一印象中，就孕育着以后两人交往的矛盾特征。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说：

“那时甘地出现了。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新鲜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长地松了一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了黑暗，并拔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又像一阵旋风，吹翻了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激动了人民运用思想。……他所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只接受一部分，有时竟根本没有接受。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他的教义的精髓是无畏、真理和与这些相关联的行动，他总是关怀着人民大众的福利。”

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以甘地和尼赫鲁之间政治关系的这种矛盾性特征为主线，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分析，在系统性、客观性、全面性、明确性和揭示实质等方面，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在国内，此项研究属空白点上的新作，在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较，也有许多深化之处。这些深化性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现代印度和南亚民族民主运动发展轨迹和当代印度发展的道路，从而在专门课题上深化了印度当代史的研究。

我在这里着重从历史交往的角度，谈谈研究甘地与尼赫鲁之间政治交往的意义、方法和内容。在人类历史上，确有不少伟人之间友好交往的美好友谊故事。列宁曾经举出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亲密友谊的突出事例。但在伟人之间的政治交往中，我们更多地见到的往往是由于权力因素或经济利益而出现残酷争斗导致悲惨破裂的结局。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奇里斯玛”型的领导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因历史交往的负面作用导致分裂，这就不是一般人的交往问题，而构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了。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位伟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虽一直处于矛盾

性状态，却能够在民族民主运动进程中并肩携手、合作共事，直到甘地逝世，历时近30年之久。这种长期政治合作的历史交往，成为一件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本书作者对这一历史现象首先作了历史分析。他把甘地与尼赫鲁之间的政治交往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1926年，包括在1919年的反罗拉特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1920~1922年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1923~1926年不变派与主变派之争这些主要历史事件中他们之间的政治交往。第二阶段是1927~1938年，包括在1927~1929年青年独立派的崛起、1930~1934年文明不服从运动和1935~1938年国大党省自治这些主要事件中他们之间的政治交往。第三阶段是1939~1947年，包括1939~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国大党的分化、1942~1944年退出印度运动和1945~1947年印巴分治这些主要事件中甘地与尼赫鲁之间的政治交往。

这种历史的、动态的分析，把两位伟人的政治交往置于具体国内外变化着的环境和发展进程之中。这对于研究有影响社会进退的政治家的历史交往是一种很合适的方法，在历史交往方面的许多问题，可以得到恰当的正确解释，并且使人们容易在纷繁的变化与复杂矛盾交织中，把握住中心线索。但是，到此为止，并不能得出相应的、有历史启示性的结论。历史的分析必须具备逻辑性分析的协作。因此在此基础上，作专门的理论概括，对深入研究两位伟人的政治交往是完全必要的。

实际上，作者也正是在本书终篇中着重研讨了甘地与尼赫鲁的分歧与对话的内容、原因、实质和意义。这样，既避免了仅在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上就事论事的片面性，又避免了仅从思想观点上以点代面探讨的片面性，使问题的研究更接近于全面和客观。包括伟人之间交往在内的人类历史交往的实践活动问题，是一个新的课题。研究新课题需要新的方法。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以历史的纵向考察与理论的横向剖析相结合，以逻辑的比较与归纳相参照的综合方法，已被证明其学术理论上的实效性。

伟人之间的交往，和其他历史交往一样，是双向的、相互的。这在甘地与尼赫鲁之间的政治交往活动中清晰可见。他们之间相互的分歧不仅始终存在，而且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始终存在。分歧可以说是尖锐的，而且涉及到民族民主运动的目标、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他们分别代表了民族民主运动中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不同潮流，在政治理论上看来是不可调和的。但在政治实践上，这两种潮流的主要领导人的交往并未演化为不相容的相互交恶，也未使交往破裂而分道扬镳。沟通分歧的主要渠道是对话。从交往的程序看，是分歧—对话—妥协—合作。对话是一个关键环节，是消除或淡化分歧、彼此让步、求同存异而走向真诚合作的主要交往步骤和渠道。对话的形式有：直接对话（交谈、争辩、讨论）、互相通信（解释各自观点）、在报纸上开诚布公讨论分歧。在甘地和尼赫鲁之间的政治交往中，不但分歧与对话始终交织，而且总是不隐瞒各自的观点和对对方行动上的不满，并能以真诚的对话面对分歧，经过对话相互妥协，达到真诚的合作。

具体地说，他们都以民族独立事业的政治大局为重，在实际行动中互相克制和让步，维护国大党统一，在思想理论上彼此修正和主动靠近，以求步伐一致。互相理解和互相信任是真诚对话的必要前提。例如，关于非暴力主义问题，甘地和尼赫鲁经过多次对话，发生了很多变化。当1922年曹里曹拉事件后甘地突然终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尼赫鲁表示极大不满。甘地向尼赫鲁写了一封长信，承认这个决定在政治上是不合理、不明智的，而在宗教上却是正确的。尼赫鲁对这个解释表示理解，并为甘地的决定找了许多客观理由。双方通过对话沟通了。1942年关于是否用非暴力方式保卫印度问题，甘地和尼赫鲁进行了多次激烈争

论，甘地改变了观点，不反对武装保卫和抵抗法西斯，而且以后多次声明，支持尼赫鲁用武力捍卫民族利益的立场。尼赫鲁则敬佩甘地在非暴力原则与印度自由二者的选择中的“现实政治家”战胜“不妥协先知者”的“惊人转变”。双方对话渠道再次沟通，求同存异，达到了真诚的合作。

甘地和尼赫鲁一为传统主义、一为现代主义，但他们的思想深处上都有对人的关注，而“人”在甘地思想中尤为精髓所在。从他们之间长期真诚的对话和真诚的合作历程中，我们感受到从交往的视角观照人的本质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是在长期合作共事中产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便成为他们真诚开展对话、从而解决或淡化分歧和使对话成为有效交往的渠道。从他们运用对话方式进行合作的经验中，揭示了社会交往所凝聚和沉淀的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人们的交往一方面是作为个人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一定社会身份和角色的交往，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人的本质是人的个性和社会特性的统一。甘地和尼赫鲁在政治家的人际交往中，把传统性与现代性既作为各自的个性、又在各自的社会性中汇流和交织，并形成合力，在印度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发挥作用。我们从他们两个伟人的长期历史交往中，看到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缩影——一个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解决传统与现代这一对矛盾的缩影。

印度学者和诗人泰戈尔在《没有墙的文明》中写过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印度人……把世界和人在一起包括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里。印度人强调在人和宇宙之间和谐，他们认为如果宇宙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无关的东西，那么我们将不能与周围环境有任何交往……这就是为什么《奥义书》将获得人生目的的人们描写成‘宁静的人’，‘与神合一的人’的原因。”交往所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因为这是世界新文明的中心。交往也追求人际之间和人与大自然的协调和谐，尤其关注工业化、科技与人文因素的

结合。交往的这些追求和 21 世纪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是完全一致的。进一步研究人类的历史交往遗产，包括甘地和尼赫鲁之间交往的遗产，对于在各国现代化建设中加强交往活动的途径、方法和措施，对于培养人们的交往意识和交往能力，都具有启迪意义。

1949 年，克里帕拉尼在孟买出版的《甘地、泰戈尔和尼赫鲁》一书中，称甘地和尼赫鲁长达 30 多年的结合是“人类合作的史诗”。该书还指出，他们两人的名字在印度自由斗争史上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人们写书和阅读历史，他们就会一起受到人们的纪念”。

现在，有一个中国青年学者把甘地和尼赫鲁的合作史诗写成书出版了。他，就是尚劝余博士。这本书虽然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但写这本书的科研积累却有 6 年以上的时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尼赫鲁其人及其思想》。他围绕这个课题写过系列论文，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有关甘地和尼赫鲁的学术论文就达 9 篇之多。我作为他的博士导师，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曾建议加以修改后早日出版。在本书出版之际，劝余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了。师生情谊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我为我的学生每一成果发表的高兴心情，实不亚于自己成果的发表。欣喜之余，我在序中把我近几年关于“历史交往”问题的思考也写进去了。因为我感到甘地与尼赫鲁的关系，是一个围绕民族复兴对话的历史交往的典型史例，所以把序言写得长了一些，目的在于进一步加深研究。

彭树智

1996 年 11 月 25 日于西北大学悠得斋

序 二

本书作者尚劝余博士与我交往多年。交往的契机就始于我同黄心川和林承节二位教授一道，受邀主持参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尼赫鲁与甘地》的答辩会。其后，我与他多次合作写书，保持着经常的通信和电话联系。今天，喜闻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尼赫鲁与甘地》将付梓问世，不禁欣然命笔为之作序。

1919~1947年是印度民族民主运动史上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年代。在这一历史大转折时期，印度政坛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矢志于独立事业的仁人志士，其中享有全国声誉并能够左右印度政治局势的两位举足轻重的民族运动领导人是甘地和尼赫鲁。甘地和尼赫鲁以其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超凡的人格力量，感召了印度社会各阶层民众，使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形成汹涌澎湃的滔滔洪流。在反帝斗争的洪流中，甘地和尼赫鲁之间既分歧又对话的合作关系贯穿于民族民主运动的始终。每一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有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分歧与对话的印记。可以说，甘地和尼赫鲁之间的政治合作历程就是现代印度民族民主运动轨迹的缩影和写照。因此，将甘地和尼赫鲁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置于现代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大背景中去探讨，既是对甘地研究和尼赫鲁研究的拓宽，也是对印度现代史研究的深化，这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体现的第一层面。

甘地和尼赫鲁既是并肩战斗、合作共事的战友，同时又是具有师徒关系的两代人。甘地虽然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的熏陶，但

他主要立足于印度传统，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传统印度的象征；尼赫鲁虽然珍视印度传统，但他更热衷于现代文明，是现代印度的代表。可以说，不研究甘地，就不能深刻地了解印度的过去，不研究尼赫鲁，就不能透彻地认识印度的现在。而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既分歧又对话的合作关系，实质上就是新旧印度交替时期的历史转折时代里传统印度和现代印度之间的碰撞与汇流的折射和反映，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因此，探讨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对当代印度发展道路的理解，有助于深化印度当代史研究，这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体现的第二层面。

总之，要了解现当代印度，就不能不研究甘地和尼赫鲁两人的关系，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尼赫鲁和甘地关系研究方面的空白，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功深力厚之作。

是为序。

陈峰君

1995年11月27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序 三

今年四月参加“玄奘 1330 年国际讨论会”，欣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在 22 日晚上为尚劝余先生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本人与惠敏法师能受邀观礼，深为荣幸。

在台湾，本人亦只是极少数对印度学术稍有涉及之爱好者。实鉴于中印文化交流的纽带从史前到现代都是一直的息息相关。

民国十三年，梁启超与徐志摩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列举了十多种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文化，诸如雕刻、绘画、文学、音乐、音韵等；又如深入民间之阎王、中元节，以及捉拿生魂说之黑、白无常等，也都受到印度之影响。

而且，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印度也是倡导社会主义之国家；也是中国最大之邻国。在历史上，中印两国，虽有偶尔的冲突，但总体上是水乳交融、和睦相处的。总之，中国对印度学术之研究，是有必要加以鼓励与重视的。

尚先生愿意投入这一方面之研究，确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尤其研究《尼赫鲁与甘地》更为重要。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领导印度独立的灵魂人物，所以尚先生本书对于现代印度之研究也是有贡献的。

在研究方法上，尚先生是以纪年方式，多将两者之思想、言行作平行地比较，其最大优点是：纪年有序，巨细无遗，可见全书之精致细密处；或亦稍难窥全豹之失，但总的看来，瑕终不足以掩玉。

印度古代有僧伽 (SAMGHA) 一词，原意为社团组织体，以后各宗教沿用作僧团之组织。亦如中国之“寺”，原为招待外宾，尤其西域来华之高僧大德，所以以后之宗教道场，亦沿用为“寺”。甘地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教育思想，都是本着“僧伽”一词而来，无不以培养人的灵性为依归；而尼赫鲁虽也是以印度文化为本位，但也接受西方社会主义，主张渐进的社会所有制，着重民生之改革。

尼、甘两氏，在领导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在思想上，在方法上，有同、有异，有分、有合，就是基于此；从而，也可明白印度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同、异所在。

若能本着此一线索来阅读本书，自可见到作者用心之切与功力之厚，因有同好之雅，尤感后生可畏，故不惜孤陋，允以为序。

李志夫

1994 年 11 月 29 日序于台北市

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筹备处

绪 论

1919~1947年，是印度奋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民族独立的时代。甘地和尼赫鲁是这一时期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中两位最主要的领导人。他们在民族民主斗争历程中合作共事、并肩战斗达1/4世纪之久。甘地与尼赫鲁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成为印度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研究尼赫鲁—甘地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尼赫鲁和甘地之间的观点分歧和对话，从而深化尼赫鲁研究和甘地研究，而且有助于揭示现代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轨迹和当代印度的发展道路，从而深化印度现当代史研究。

迄今为止，尼赫鲁—甘地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我国学术界在甘地研究和尼赫鲁研究方面，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入，但仅限于对甘地和尼赫鲁进入分别研究，尼赫鲁—甘地关系的研究仍然是空白，国外学术界对尼赫鲁—甘地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为重视，有关尼赫鲁研究的著述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尼赫鲁—甘地关系问题，同时也出现一些专门探讨尼赫鲁—甘地关系的著述。然而，这些研究均存在不少问题，暴露出许多缺陷，未能系统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尼赫鲁—甘地关系的真相和实质。

本书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纵向考察与横向剖析相渗透、归纳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尼赫鲁—甘地关系。本书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分三个时期考察尼赫鲁与甘地

关系的演进历程，后一部分探讨尼赫鲁与甘地关系的特征、实质及意义。最后从尼赫鲁—甘地关系中揭示出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轨迹和当代印度的发展道路。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探讨成果如下：

第一，从1919~1947年，尼赫鲁与甘地在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中合作共事，并肩战斗近30年之久。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演进时期：1919~192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也是尼赫鲁与甘地关系的初始时期；1927~1938年，是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时期，也是尼赫鲁与甘地关系发生尖锐冲突的时期；1939~1947年，是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最后阶段，也是尼赫鲁与甘地关系的最后时期。

第二，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不仅自始至终存在，而且涉及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各个方面。具体归纳为三个方面：（1）民族民主运动的目标（20年代表现为自治领地位与完全独立之争；30年代表现为独立的含义及策略进程问题上的分歧；40年代表现为印巴分治问题上的分歧）；（2）民族民主运动的方法（表现在非暴力主义和神秘主义两个方面）；（3）未来社会的设想（表现在理想社会和现实社会两个层面上）。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首先可追溯到他们各自的出身环境和早期经历、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诸方面。而更为深刻的根源则在于他们代表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两种不同的派别和趋势，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激进派与温和派、现代趋势与传统趋势之间冲突与碰撞的折射。

第三，尼赫鲁与甘地之间虽然分歧重重，但并未导致关系破裂，而是采取对话的形式，彼此妥协和让步。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实际行动方面（具体表现在：①1928年的完全独立与自治领地位问题；②1929年的德里宣言；③